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民主体性建构的几点思考

牟成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 当下探讨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民应该具有怎样的主体性,如何来建构这些主体性将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思考。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性;政策供给;农民解放;建构

中图分类号: D4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3)02-0030-06

Reflections on Farmers'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MOU Chengwen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wo issues: firstly, what kind of subjectivity farmers in China should hav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secondly, how to construct the subjectivity. The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some valuable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Key word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farmers' subjectivity; policy supply; farmers liberation; construction

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转型期国家对“三农”进行全方位渐进式改造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国家以现代性规范来对传统社会进行深刻变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国家根据理想性预期来重建乡村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民应该具有怎样的主体性,如何来建构这些主体性,等等,则是需要探讨并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市场化变革塑造了自主性农民。可以说,自主性,最能够凸显农村社会变革给我国农民主体性所带来的深刻变化。自主性,是民主实践的基础,是自由体验的前件,是改革开放能够继续前进的必备要件之一。但是,仅有自主性的农民,又是不足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因为要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还要求农民必须具备符合时代特征和历史特征的信仰、担当、正义感和创新精神。如此一来,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使命决定我国农民的主体性还必然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收稿日期: 2013-01-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编号: 12AZD032)

作者简介: 牟成文(1965-),男,湖北荆州人,法学博士,哲学博士后,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

或者特质: 坚定信仰, 社会担当, 明确正义感, 自为创新精神。

信仰, 是一种精神寄托, 也是一种理想预期, 更是一种形上追求。人, 不只是生活在一种纯粹的物质世界之中, 虽然物质世界的存在相对于人的存在是必需的、基本的和决定性的。人还必须生活在一种由理念、意识、观念和各種思想所组成的精神世界里。农民作为一种“存在着”也一样具有上述存在特性。农民需要一种精神寄托, 这种精神寄托包含着农民对自身存在的筹划、计算和布局。而在对自身存在的筹划、计算和布局中, 农民又需要一种理想预期作为一种现实图景来规范自身的存在活动, 不管这种现实图景是以其自身存在的历史作为底色, 还是以其自身存在的未来作为底色, 它都承载着一种价值标准。既然具有价值标准的功能, 那么, 它也必然能够打通同形上追求的进路。之所以说是形上追求, 是因为追求“着”的存在并不是现实存在, 只是一种意识性存在; 或者, 追求到的存在只是一种历史性存在, 而这种历史性存在只能在形而上学之意义上才获得一种存在论的价值和意义。农民, 无论是作为一种特定职业, 还是作为一种特定身份, 还是作为一种特定符号, 都需要贯穿于特定的信仰之中。但是, 在物质主义放浪的语境里, 农民的信仰正在趋近于“单向度化”或者纯粹物质化。这样, 物质主义把农民改造成自己的背书或说是牺牲品, 或者农民把物质主义领会为存在主义的全部, 正在成为一种趋势。新农村建设要求农民应该有信仰, 当然这种信仰不只是物质主义的, 还应该是精神主义的。这种精神主义主要表现为: 对社会存在过程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and 把握, 对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and 把握, 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价值和意义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and 把握, 对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and 把握, 对自身存在的过程、趋势和结果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and 把握。

担当, 是与承担一种责任和义务相适宜的。而责任和义务不仅包括个体性的, 而且还包括社会性的。农民, 首先要成为一种个体性存在。而要成为个体性存在, 就要求农民作为一种存在个体能够支撑起个体性存在的责任和义务。而要能够支撑起个体性存在的责任和义务, 就要求农民能够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来继续自身的存在、创造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自身的存在, 并通过这种继续、创造和发展来凸显存在本身的积极性价值和意义, 而不是消极性价值和意义。农民的个体性存在是社会性存在的基础。没有个体性存在, 就不可能有农民的社会性存在。但是, 仅有农民的个体性存在, 还不能实现农民的社会性存在, 因为要实现农民的社会性存在, 除了农民的个体性存在以外, 还存在诸多相关性因素和环节, 而农民的个体性存在只是其中的一个必要因素和环节。在由个体性存在向社会性存在奔赴的过程之中,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主体的农民至少需要作以下三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 农民需要建构一种社会尺度并以此来规约自身的存在; 第二, 农民需要把整体性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同自身存在的必然性进行有机对接并由此来规约自身的实践活动过程及其活动结果; 第三, 农民需要把自身的存在融入到时代和历史之中并在时代和历史之中获得其自身存在的动力, 并通过自身的存在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类的发展。

明确的正义感是对德性、良善和义理的阐释和宣示, 是通向幸福的必要环节和必由之路。明确的正义感是根本超越“自爱原则”的。农民作为一种自发性存在的主体, 主要表现为自我的怜惜、自我的热爱和自我的认同; 作为一种自为性存在的主体, 必然要根本超越“自爱”, 进入“理性之爱”的视阈, 并通过社会尺度来阐释真善美、来鞭挞假丑恶。正如康德所说的“自爱的原则虽然可以包含有熟巧……的普遍原则, 但这样它们就只是一些理论性的原则……”。不过, 基于这些原则的实践规范却永远不能是普遍的, 因为欲求能力的规定根据是建立在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上的, 这种情感永远也不能被看作是普遍地指向同一些对象的。”“自爱的原则……绝对没有可能……冒充为实践的法则。”^{[1] (P31-32)} 当然, 我们不能用哲学家或者道德家的尺度来规约作为一种经验性存在的农民, 但是, 作为一种存在根据, 即使这种存在根据从根本上看主要是经验性的, 它也仍然需要理性的审视, 因此, 在理性之中审视农民的经验性存在就是合理和必然的。要使作为经验性存在的农民根本超越“自爱”, 并进入“理性之爱”的视阈, 就需要农民根本超越自身的经验性存在所确定的狭隘眼界, 就需要农民把自身的存在融进时代精神和历史精神之中并通过这种融进来根本克服自身的自发性、盲目性、消极性和狭隘性等落后性特点。

创新是存在的基地,创新是变革的动力,创新是发展的源泉,创新是实践的结果。农民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的主体,是与创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农民作为一种结果性存在就存在于自身的创新之中,不管社会或者国家对农民给予怎样的资源性供给或者政策性供给,而这些供给本身都要经过农民的创新性实践的加工和改造,才能最终转变成为一种现实的物质力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农民的创新性存在是一种不需要哲学审视的过程和结果。由于农民的创新性存在本身包含着自发性和自为性等两种可能性,因此,对它进行审视就是必然的。作为一种自发性的创新所反映的农民的实践性存在只能是一种自然性的存在,只能是一种随波逐流的存在,只能是一种被动性的存在。在这种语境里,农民的主体性是农民通过把自身的存在主要定义为一种客体性存在而得到呈现的,因此,这种主体性常常表现为逆来顺受、被动适应、消极等待和随机观望等。而作为一种自为性的创新所反映的农民的实践性存在主要是一种创发性的存在、主动把握自身存在的存在和引领时代和历史潮流的存在。在这种语境里,农民的主体性是农民根本超越了自身的自发性所确立的狭隘视阈从而进入了整体性的存在世界而得到呈现的,因此,这种主体性主要表现为开拓进取、主动出击、缜密筹划和不断变革等。新农村建设工作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改造“三农”的重大使命,因此,它必然要求具有时代主体性的农民在创新问题上根本超越自发性存在所确立的有限视界,进入到自为性存在所确立的无限视阈之中去。

二

上述分析主要是一种规范性分析,由此所确立的各种规范性标准都是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要求相适应的,因此,建构新时期我国农民的主体性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由于这些规范性标准必然是高于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现实和农民的存在现实的,因此,如何建构新时期我国农民的主体性就成为一个超越农村现实存在和农民存在现实的关键问题。如何建构新时期我国农民的主体性,在笔者看来,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国家作为引导主体要适时地引导农民沿着规范性路径发展;二是农民作为实践主体要能够在国家的引导下与时俱进地建构和变革自身的主体性。

国家应该如何适时地主导农民建构主体性呢?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国家应该不断地、适时地向“三农”提供政策供给。所谓政策供给就是国家向“三农”提供各种政策支持、政策激励、政策调节和政策限制等并由此来引导“三农”沿着规范性路径发展。政策支持和政策激励主要是国家向“三农”所提供的正相关要素。政策调节是国家向“三农”所提供的中性要素。政策限制是国家向“三农”所提供的负相关要素。国家既需要通过提供正相关要素来鼓励“三农”的规范性发展,又需要通过提供中性要素和负相关要素来调节和抑制“三农”的不合时宜的发展或者非规范性发展。政策支持主要是国家通过实施各种鼓励性政策来直接把自己所掌握的资源集中地运用到“三农”并由此来促进“三农”的优先发展和变革。政策激励主要是国家通过实施激励性政策来从整个社会中调配资源并由此来刺激“三农”的发展和变革。政策调节是国家通过实施各种调节性政策来帮助不同行业、不同部类、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不同地方等重新分配各种社会资源,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政策限制是国家通过实施限制性政策来抑制或者制约“三农”的某种不合时宜的、不合规范的变革和发展,或者从“三农”中进行某种提取以促进其他行业、部类、部门等的发展。政策供给必然包含着两方面的政策提供,即一方面是政策鼓励,另一方面是政策抑制。在这两方面之中,只有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并由此来构建政策供给都是不完整的。当然,有时只需要其中某一方面的政策供给,有时又需要两个方面同时并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供给,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实践问题。归根结底,它需要根据国家和“三农”的具体发展状况来决定,它需要根据某种特定的规范性预期来决定。政策供给从内容上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经济性政策供给、政治性政策供给和文化性政策供给。政策供给是国家引导社会发展的主要杠杆和调节器,也是国家引导“三农”发展的主要杠杆和调节器,也是国家引导农民建构主体性的主要杠杆和调节器。

第二 国家应该不断地、适时地向“三农”提供资源供给。所谓资源供给就是国家根据自身的规范性预期来聚拢社会资源并将聚拢到的社会资源优先分配给“三农”,从而促进“三农”的发展。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资源供给也是双向的:既有国家向“三农”输出各种资源,也有国家从“三农”中提取各种资源。国家有输出,也必然有提取,或者说,国家有提取,也必然有输出。而从“三农”角度来看,资源供给也是如此。资源供给最先牵涉到的问题就是“资源”的问题。“资源”主要包括物质资源、政治资源和精神资源(或者文化资源)。因此,资源供给也必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物质资源供给、政治资源供给和精神资源供给(或者文化资源供给)。从本体论上讲,政策供给也是一种资源供给,同时,资源供给也与政策供给密不可分。因为政策供给所供给的主要是一种政策性资源,而且这种政策性资源只有依赖资源性存在形态才能转变成现实存在形态。资源供给能否实现预期,首先所依赖的就是政策供给能否到位。如果政策供给是适时的、到位的,那么,资源供给就很可能到位,否则,资源供给就不可能到位。尽管资源供给同政策供给具有密切的关联,但是,它们之间又具有巨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前者是一种现实供给,而后者只能是一种潜在供给;前者更具诱惑性和直接引导性,后者只能是在充分理解和领会的基础之上才能变成一种引导。因此,前者本身就是能够充当特定目的和结果,而后者只能在其他中介和环节的参与下才能变成特定目的和结果。如此一来,资源供给又是一种不同于政策供给的供给。资源供给是国家引导社会发展的直接杠杆和调节器,也是国家引导“三农”发展的直接杠杆和调节器,也是国家引导农民建构主体性的直接杠杆和调节器。

第三 国家应该不断地、适时地向“三农”提供关系供给。所谓关系供给就是国家向“三农”提供各种社会交往的平台、条件和机会并由此来促进“三农”的发展。任何一种潜在存在变成现实存在都是在特定的关系中实现的,因此,特定的关系对于特定的存在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01)]农民,作为一种实践主体和现实存在,同样也体现了作为特定总和的社会关系。这种特定总和的社会关系不仅包括着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与同类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括着农民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与农业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着农民与整体性社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等等。农民与自身所面对的各种关系构成了一种“农民性存在”,而“农民性存在”就是国家性存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性存在”在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表呈的只能是一种历史或者历史的记忆。但是,要把这种历史或者历史的记忆推向未来,作为过程载体的农民就必须不断地把自身已有的社会关系推向到更为宽广的区域。农民,作为一种职业和身份,首先就标志着自身同土地具有最为直接的缘在关系。农民正是通过这种缘在关系才实现了自身的职业和身份的绵延。而要实现“三农”在质上的飞跃和裂变,就需要国家不断地、适时地向“三农”提供关系供给。而关系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横向关系,另一方面是纵向关系。前者所表现的是“三农”同时代之间的关联;后者所表现的是“三农”同历史之间的关联。关系供给与前两种供给具有密切的关联:关系供给与前两种供给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化约。同时,它们之间又具有重大区别:关系供给主要体现在国家在农民交往、农村变革和农业发展上所提供的各种技术手段、实现路径和可用平台等之上,由此,关系供给主要从技术性角度反映了国家对“三农”所提供的要素供给。而前两种供给同关系供给相比,更能够突出国家供给的本质性和缘在性。因此,关系供给是国家引导社会发展的又一调节器,也是国家引导“三农”发展的又一调节器,也是国家引导农民建构主体性的又一调节器。

农民作为实践主体如何在国家的引导下与时俱进地建构和变革自身的主体性呢?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农民需要根本变革自身的精神状况实现人的精神解放。第一,我国农民需要认识自身在转型期所具有的历史使命。我国农民创造了“中国奇迹”,^[3]因此,我国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种定位是没有异议的。农民自身在创造历史,这对于农民来说,只是一种纯粹的客观事实。如果在农民那里,这

种纯粹的客观事实不能转化成农民的内在意识或者知识,它就不能构成我国农民的思想、观念或者精神。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人自身就是真理,只是没有意识到它的人很多。因此,农民不能仅仅被人理解为一种产业的承载者,而且还要被理解为一种社会主义事业的承载者。这就需要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并通过新农村建设来根本变革农民的精神状况、思想状况和观念状况。而变革农民的精神状况、思想状况和观念状况的最为根本性要务就是实现我国农民的精神解放。第二,我国农民需要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宣示或者口号,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不是一种单个人所为就可以实现的预期,而是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一种期待和理想。在农民依然还占有大多数的国度里,如果一个作为大多数的人依然还对自身的社会实践所包含的历史使命还是模糊的或者根本不清楚,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必然就有危险。因此,社会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思想性存在,还是作为一种实践性存在,都需要在我国农民的精神世界生根开花结果,并以此为契机来实现我国农民的精神解放。第三,我国农民需要认识自身在转型期所具有的历史使命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之间的有机联系。我国农民自身在转型期的历史使命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统一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事业是由人来实践和创造,才能实现的一种理想预期,它不是一种自在的存在,而是一种生成性存在,它需要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一种历史变迁。对于这样一种正确认识的揭示和理解,不能只被领会为一种上层机构的专职,而应该被认为是一件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通事务,因此,只有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这种创造性实践并在这种实践中深刻领会其意义和价值才能根本实现的一种特定变革。

另一方面,农民需要根本变革自身的物质生活状况来根本实现农民自身的物质解放。我国农民的解放不是一种纯粹的思想活动,而是一种历史活动,而是一种同传统的束缚实行最为彻底决裂的历史实践活动,这就要求我国农民不仅要根本变革自身的精神世界,还要根本变革自身的物质世界。变革精神世界是所有变革前提,变革物质世界是所有变革的基础。变革二者或者对二者的根本性变革共同寓于农民的实践行为之中。如何变革农民的物质世界并实现我国农民的物质解放呢?在目前形势下,笔者认为:第一,农民应该站在一个特定区域的角度善于发现自身的特色并由此来确立自身的优势性存在。比如,某一个村庄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不同于其他村庄的存在,就因为它具有自身的特色,正是这种特色才构成村庄的独特性存在。特定村庄所具有的独特性表现在其自身存在的诸多方面。因此,在经济上,村庄也必然是具有独特性的。特定的村庄所具有的独特地理位置必然造就出资源分布的独特性、人口分布的独特性、自然生态等方面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可以成为一个特定地方经济发展的劣势,同样也可以成为一个特定地方经济发展的优势。在劣势与优势之间,首先并不表现为一个关于存在的本体论问题,而表现为一个关于思想的认识或者认识论问题。同样的独特性,在慧人眼里可能会成为金饭碗,而在庸人眼里只能成为泥饭碗。因此,判别劣势与优势,如果仅仅只是一个偶然性的问题,那么,这种偶然性本身就是必然的;如果仅仅只是一个必然性的问题,那么,这种必然性本身也就是偶然的。这就需要村庄一定要具备主体性意识和观念。特定村庄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之中,自然需要接受普遍性的影响和规范。但是,村庄在接受普遍性的影响和规范的时候,也一定要善于保持自身的特殊性,绝不能让自身的有价值的特殊性完全消融在漫无边际的普遍性海洋里。第二,农民要通过产业发展来确立经济发展的板块格局。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任何一种村庄之外的力量或者能量在特定村庄看来都只能是一种外在因素,而不可能是一种内在因素。在此语境下,村民是其所在村庄的主体,因此,村民在建设自身的家园中必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村庄的经济发展需要将自身的独特优势发展成为产业,只有这样,村庄的经济发展才能继续下去。如何来发展产业?这是很多村庄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任何一个特定村庄都有一定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被细分为: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土地收获物、各种养殖物、地下资源、区位优势或者地理资源等等,村庄自身所具备的这些资源就是村民赖以生存的条件和法宝。在市场化语境里,这些资源都可以成为产业化的条件、中介或者环节。当然,仅仅只有资源,

还不足以支撑起产业化的架构或者格局。还需要把上述两种因素联合起来考虑。这样,就需要村民善于解放思想,具有把握机遇与应对挑战的能力,具有把劣势转化为优势的能力,需要有能人来带动村庄的整体性发展。发展起来的产业对于村庄的未来发展所产生的乘数效应是举足轻重的:产业的发展能促进特定村庄的集体公益;产业的发展能增加村民的个人财富;产业的发展可能会促进村庄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和谐发展。第三,农民要通过加入经济合作组织来增强自身的联动功能。市场化语境下,村庄的经济要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只有加入经济合作组织才是可能的。目前,农业是一种典型的弱质产业,尤其在开放条件下,其弱质性更是明显。所以,世界上不少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都对农业采取了积极的支持和扶助政策,其中就是通过经济合作组织来增强农业的联动功能。而在我国,已经有一些农民开始加入特定的经济合作组织,但是,这种加入还只是极为初级的尝试,而且这种加入还极为不规范。不仅一些经济合作组织本身需要进一步规范,一些经济组织的延伸链条或者网络需要进一步规范,而且一些相关法规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加入特定的经济合作组织,走产业化经营道路必将是一种主要发展趋势。产业化经营要求把农户家庭、农业行业协会、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合作组织等组合起来建立“四位一体”的高效农业模式,这种模式在发达的物流体系下必然大大整合农业或者特定村庄的联动功能。它不仅会大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还会大大加强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只有这样,我们所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才能比较顺利地实现预期,我国的国家和执政党才能通过新农村建设顺利实现自身的各种预期。

参考文献:

- [1]〔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0,(1).

(责任编辑:郭荣华)